

廖春 著

# 中国企业的治理与创新模式 与“美英模式”和“德日模式”的比较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013070213

F279.23  
697

廖春 著

中国企业的治理与创新模式  
与“美英模式”和“德日模式”的比较



F279.23  
697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6789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企业的治理与创新模式:与“美英模式”和  
“德日模式”的比较/廖春著. —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5432-2237-3

I. ①中… II. ①廖… III. ①企业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F2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5712 号

责任编辑 王 萌  
装帧设计 路 静

---

中国企业的治理与创新模式:  
与“美英模式”和“德日模式”的比较  
廖 春 著

---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3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176,000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237-3/F·628  
定 价 32.00 元



## 中文版序

本书所论述的是 1998 年到 2008 年 10 年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即双重结构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发展，及其对我国实现经济赶超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

在分析比较企业治理结构的基础上，本书发现，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的市场经济模式类似于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即德日模式；而我民营经济部门的市场经济模式类似于自由市场经济，即美英模式。由于每一种市场经济模式都有与其相对应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机制，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有着组织型的核心竞争力和协作渐进式的创新机制，而自由市场经济有着市场导向型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激励型的激进式创新机制，所以我国这种双重结构的市场经济模式有利于获得双重核心竞争力和双重创新机制。而且，这种同发达国家模式的兼容性有利于我国更为有效地吸收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这又引发了双向赶超效应，从而成功地实现了我国这 10 年的经济赶超战略。可以说，这个“经典模式”在实现我国经济赶超，并保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这两个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个“经典模式”也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结束转轨，成为了具有双重结构的市场经济。在国际上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论点，认为中国经济仍然是转轨型经济，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这个论点实际上是单单以美国模式来衡量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是否到位，尤其是拿中国国有经济部门同美国模式进行对比。然而，市场经济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德国模式也是两个基本的主流模式之一。虽然我国国有经济部门市场经济的发展同美国模式不同，但是，同德国模式却极其相类似。所以如果以德国模式来衡量中国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就会发现国有部门市场经济的改革已经基本到位，而我民营经济部门的发展采取的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类似于英美模式。所以说，我国经济已经结束转轨，我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双重结构的市场经济模式。

这个“经典模式”也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能够保持经济发展的稳控性和信心，这也是无论“美国模式”还是“德国模式”都难以做

到的。

为什么要在现在提出那 10 年的“经典模式”呢？因为它对我国经济在如何选取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经典模式”形成的基础在于：我国国有经济部门和民营经济部门相对平衡地发展，而且有各自主导的领域，即国有经济集中在国家战略性经济领域，民营经济集中在竞争性的经济领域。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两种倾向总是存在着。一种是强调中国走自由市场经济（即美国模式）的发展道路，要求在国有经济部门也照搬美国模式而不断地推进市场化。另一种则强调不断地扩大国有经济发展的势头和领域，甚至有完全替代民营经济部门发展的倾向。而这两种倾向都是要使我国经济走向单一结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要么美国模式，要么德国模式，而这就会使得我国原来所具有的双重核心竞争力和双重创新机制变为单一的竞争力和单一的创新机制。再进一步地来看，如果我国市场经济完全采取美国模式，先不说这在我国是否符合国情，是否行得通，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国的美国模式的市场经济发展同美国的差距相当远。尤其是在风险资本市场对创新型民营企业支持的力度，以及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力和发展水平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相反，如果我国市场经济完全采取德国模式，我国同德国模式的高品质、高素质、高精确度的发展水平也相差甚远。所以说，我国的这种“经典模式”，即双重结构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这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双重结构的市场经济模式能够使得我国经济具有双重合力，同其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单一模式相比，这是我们能够同其抗衡的优势所在，也是追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捷径。

本书是笔者于 2009 年由 Springer 出版的英文专著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s of Chinese Firms: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Growth in a Dual Economy* 的中文版，由 Springer 授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格致出版社在中国出版。该书在国际理论界所公认的对不同国家市场经济模式进行比较的方法基础上，又另辟蹊径地形成了一套适合于分析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方法。书中的观点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美国、挪威、英国等国在市场经济模式、企业发展模式及创新模式国际比较研究领域里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正在尝试用这样一套研究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方法；即用“中国模式”反过来再来研究经济危机形势下的美国、英国、挪威等国的经济。他们希望能够利用书中所论述的中国国有经济部门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尤其是利用中国国有经济部门的国家创新模式，来寻求这些国家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出路。

对于不同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企业发展以及创新模式国际比较的研究方法,即 Hall 和 Soskice(2001)及 Whitley(1999)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了国际上该领域的权威方法。本书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并利用该方法来探讨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企业治理结构和创新模式。同时,也希望通过本书将此研究方法引入国内。

## 序

自1949年以来,中国采取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目的在于支持科技和国防的发展,以赶上发达国家。此外,中国的科技政策也体现了长期以来对科技独立自主的关注。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意识到,本土技术能力的提高将有助于减少本国对外国技术特别是日本和美国技术的依赖。从那时起,中国就形成了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Holz and Tian Zhu, 2002, p. 88)。为了确保企业能服从国家指令,并确保它们的经济剩余能够用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中国建立起了国有经济制度。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实际上是为满足国家战略目标而建立的。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国家可以根据其战略目标,通过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来控制和管理经济收益和经济剩余。因此,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具有高资本密集度的特征。而且,国有企业也获得了最好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Lin, et al., 1999, pp. 66—71)。

20世纪70年代末,技术决定论的逻辑在中国被进一步强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技术)是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努力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而发展高技术经济可以为提升军事实力奠定基础。因此,在当时的中国,技术创新、技术升级和提升生产力体现在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战略口号中(Gabriel, 2006, pp. 4—6)。但是,当时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为中国提供足够的经济剩余用于获得新技术,进行技术革新和改造。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更彻底的经济改革,需要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并产生更多的经济剩余(Gabriel, 2006, p. 36)。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通过一系列实质性的改革建立起双重结构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形成相应的双重创新体系,使中国真正地走向高科技强国之路。一方面,在国有经济部门,国家所有权仍占主导地位,在国有的能源、钢铁、化工、机械和国防等部门,采取的技术创新战略主要是通过吸收、改良和应用新技术来实现这些传统产业领域的高科技发展。这种建立在“组织协

作机制”基础上不断地吸收和改进新技术，建立科技创新体系的战略，同“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和德国，所建立的协作渐进式创新体系相类似。另一方面，在民营经济部门，我国也在采取另一种创新战略，即建立市场激励型的激进式的创新体系，这是一种不同于上述以吸收改良为主的创新体系。这一创新战略主要是通过民营经济部门，尤其是在其信息技术(IT)领域，建立核心竞争力来实施，这又和“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的情形相类似。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企业主要依靠国家计划进行生产，缺乏市场竞争的激励机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开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落后、人才短缺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开始寻求技术创新，以提高竞争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企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消化吸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一过程体现了“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所倡导的自主创新精神。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企业主要依靠国家计划进行生产，缺乏市场竞争的激励机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开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落后、人才短缺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开始寻求技术创新，以提高竞争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企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消化吸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一过程体现了“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所倡导的自主创新精神。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企业主要依靠国家计划进行生产，缺乏市场竞争的激励机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开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落后、人才短缺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开始寻求技术创新，以提高竞争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企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消化吸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一过程体现了“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所倡导的自主创新精神。



## 目 录

0	导言 .....	1
0.1	0.1 本书的主要内容 .....	1
0.2	0.2 本书的主要贡献 .....	5
0.3	0.3 简评《未来的中国市场经济》一书 .....	7
1	基本理论 .....	9
1.1	1.1 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 .....	9
1.2	1.2 市场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和协作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 .....	10
1.3	1.3 两种基本类型企业治理结构的经典范例 .....	18
1.4	1.4 制度体系内互动原则以及制度的路径依赖和差异性原则 .....	34
2	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	42
2.1	2.1 国有企业重组:抓大放小 .....	42
2.2	2.2 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基础上的协作导向型企业治理结构 .....	48
3	中国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 .....	96
3.1	3.1 我国民营经济部门的行业分布 .....	96
3.2	3.2 中国民营企业的市场导向型企业治理结构 .....	98
3.3	3.3 通过市场化转型的国企、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都逐步变成 业主经营型企业 .....	134

4 中国双重市场经济结构中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所引致的双向经济赶超 ..... 147

    4.1 两个具有类似经济模式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是促使两者经济发展趋同的主要动力 ..... 147

    4.2 具有双重市场经济结构的中国经济双向赶超发达的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 ..... 148

5 结论 ..... 162

总结性表格：“中国模式”与“美英模式”和“德日模式”的比较 ..... 171

参考文献 ..... 176

后记 ..... 197

## 0 导 言

### 0.1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所处的国际学术研究领域是市场经济模式、企业发展模式和创新模式的国际比较。该领域里权威的研究方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的 Peter A. Hall 和美国杜克大学的 David Soskice 在 2001 年提出的“比较市场经济模式的研究方法”(Hall and Soskice, 2001)。本书正是基于这个研究方法,将中国的企业治理结构同两种基本市场经济模式(即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德日模式”和自由市场经济“美英模式”)中的企业进行比较,从而确定中国市场经济的模式、创新机制和核心竞争力。

在当代市场经济理论中,有两种基本的市场经济模式已被确定下来。一种是“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ies),包括美国、英国和其他英语国家,本书也称之为“美英模式”;另一种是“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包括日本、德国等国家,本书也称之为“德日模式”。相应地,本书将确定两种基本的企业治理结构:“市场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market-based firms' governance structure),即美英模式的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协作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coordinated firms' governance structure),即德日模式的企业治理结构。

对于不同市场经济企业治理结构的比较主要基于五个方面: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ownership and control)、企业间的关系模式(inter-firm coordination)、企业的劳资关系模式(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企业融资模式(firms' financing pattern)和主要业绩指标(performance criteria),以及企业的创新模式和核心竞争力(firms'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on system)。其中第一个方面即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几个方面。

市场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强调所有权边界的明晰和排他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间的协作关系和企业内部的劳资依存关系。企业的融资方式

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对于业主经营型的小企业来说,其融资则主要通过自筹资金。短期利润的最大化是这类企业的主要业绩指标。企业致力于发展市场导向型的核心竞争力(market-oriented core competitiveness)和市场激励型的激进式的创新机制(market-oriented radical innovation system)。该范式的基础调节机制是自由市场机制(market mechanism)。

协作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则鼓励所有权边界的重叠性和相互交叉持股,同时鼓励企业之间发展深层协作关系(inter-firm collaboration),并鼓励企业内部发展劳资依存关系(employer-employee interdependence)。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进行融资,而且银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play a control-oriented role)。企业的主要业绩指标关注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和长期发展。企业致力于发展组织型的核心竞争力(organizational core competitiveness)和协作渐进式的创新机制(coordination-based incremental innovation system)。该范式强调,在市场机制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之上,社会经济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可以通过非市场的社会调和和组织协调机制(non-market-mode coordination)。

自由市场经济里的企业治理结构是市场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这里包括两类企业,一类是市场化的公司制企业(market arm's length controlled firms),比如美国企业;另一类是市场化的业主经营型企业(firms that are under the owner's direct control),比如英国中小企业和中国台湾地区企业。市场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企业治理模式。

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里的企业治理结构是协作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制度化的社会调和和组织协调机制是这类企业的核心,比如德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协作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是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的基本企业治理模式。

在中国的国有经济部门,企业治理结构类似于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治理结构。仅有的区别在于,两者的社会调和和组织协调机制形成的基础不同。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中,社会调和和组织协调机制(primary coordination)实际上是“国家在国有控股基础上发挥社会调和和组织协调功能”(state coordination through its controlling shareholding),而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的企业治理结构其社会调和和组织协调机制是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 coordination)。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尚未形成这种在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里所生成的制度化的社会调和和组织协调机制(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arrangements),中国的制度环境尚不能够支持这样一种社会调和和组



织协调机制。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的社会调和和组织协调功能只能由国家在国有控股的基础上来发挥。

中国的民营经济部门主要是业主经营型的企业,该类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市场导向的企业治理结构,这类似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中国的这种双重结构市场经济(dual market economic system)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各项实质性改革后建立起来的。1998—2008年这10年间中国经济呈现出了明显的双重结构市场经济的特征。由于这种经济模式对于中国在这10年间的经济增长、高科技创新和经济赶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本书称该模式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本书所论述的就是这10年间中国双重结构的市场经济模式,将它同美英模式和德日模式进行比较,揭示该模式对于这1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高科技创新、规避经济危机和实现经济赶超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而揭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本书认为,双重结构的市场经济带来了双重核心竞争力和双重创新机制,这是难以在其他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国有控股基础上的社会调和和组织协调机制不仅在实现国家高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它带来了类似于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中的那种协作导向型的创新机制和组织型的核心竞争力。民营经济部门里的市场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带来了类似于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导向型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激励型的激进式创新机制。相对于其他单一结构的市场经济只拥有单一核心竞争力和单一创新机制而言,双重结构的中国经济拥有双重核心竞争力和双重创新体系,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优势。双重创新体系和双重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中国经济在不同层面上同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竞争。同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相比,拥有双重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机制使得中国市场经济能够在更为广阔的工业部门、技术领域和科学研究领域里成功地发展。

本书将在制度体系内互动理论(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的基础上解释为什么在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里只存在单一的企业治理模式,而在中国市场经济里却能够存在双重企业治理模式。制度体系内互动理论是指,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和互动着的,遵循着同一的运行逻辑。根据该理论,在一般意义上,每一种经济体系只能够存在一种企业治理模式。这是因为该类型企业治理模式的运作机制(coordinating mechanism)适用于整个经济体系内的所有企业,从而覆盖整个经济体系。也就是说,它是没有边界的,不能被切割或被限制在一部分的经济领域

当中。因此,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比如德国和日本,以及自由市场经济比如美国和英国,都只能存在一种企业治理模式。

但是本书发现,如果有可能找到一种特殊的企业治理模式,其运作机制有着明显的边界,即只覆盖该经济体系内的某一部分经济领域,那么这样就有可能在其他部分的经济领域当中去发展另外不同类型的企业治理模式。于是,两种不同的企业治理模式便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正是这样的一个特例。在国有控股的基础上,国家在公司化的国有企业中发挥着社会调和和组织协调功能,从而形成了国有控股基础上的协作导向型企业治理模式。这种企业治理模式的运作机制有着明晰的运作边界(clear coordination boundary):它被限制在国有控股存在的部门,即国有经济部门。国有经济部门之外的民营企业便能够发展另外一种不同的企业治理模式,即市场导向型企业治理模式。因为这两个经济部门各有着不同的运作机制而且两部门之间的边界又很清晰,于是,每一部门内的运作都能够完全遵循制度体系内互动原则。而且,正是由于遵循了该原则,因而即使这两部门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经济联系,也不会导致边界模糊和机制失效。本书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中国的特例并不违背制度体系内互动原则,作为特例,它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该理论。

在制度路径依赖和制度差异性理论的基础上,本书将分析双重结构的中国经济如何有利于中国经济双向赶超两种不同模式的发达市场经济(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又是如何驱动这种双向经济赶超的(dual economic convergence)。制度路径依赖和制度差异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如果两国的经济模式不同,那么一国就不可能通过复制另一国的模式而实现经济赶超。发达国家对于落后国家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的效应会因两国经济模式的不同而受到制约,这使得落后国家难以学习和复制发达国家模式,从而难以赶超发达国家。可见,该理论不支持具有不同经济模式的较落后国家对于较先进国家的经济赶超。但是本书发现,该理论支持具有相类似经济模式国家之间的有条件的经济赶超。中国经济具有双重结构,其分别同发达的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相类似,这就支持中国经济双向赶超这两类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而来自这两类国家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直接驱动了双向赶超。

总而言之,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具有双重结构,从而使其产生双重合力,即双重核心竞争力、双重创新机制和双向赶超效应。于是,本书就从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上来分析和揭示中国经济在1998—2008年10年间实现长期

稳定发展的制度根源。

## 0.2 本书的主要贡献

本书在企业治理结构的层面上,分析了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的不同(Hall and Soskice, 2001)。本书的企业治理结构概念是通过结合本研究领域 Hall 和 Soskice(2001)方法论中的五个基本层面,以及 Whitley (1999)的企业治理结构理念而得来的。同 Whitley 的研究类似的一点是,本书的企业治理结构也强调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本书在企业治理结构中加入了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企业对其竞争力和创新力的管理和控制。这个方面在 Hall 和 Soskice 以及 Whitley 的研究方法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可见,本书的企业治理结构研究方法应该是市场经济、企业发展和创新国际比较研究领域中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方法。

在市场经济、企业发展和创新的国际比较研究领域里,本书通过将中国模式同发达的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模式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模式。本书发现,在中国国有经济部门里,企业治理结构是以国家在国有控股基础上发挥社会调和和组织协调功能为核心的一种协作导向型企业治理结构(state-ownership coordinated governance structure),它类似于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中的协作导向型企业治理结构(coordinated firms' governance structure)。而在中国的民营经济部门里,企业治理结构是市场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它类似于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market-based firms' governance structure)。

不同的经济模式有着不同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体系(Hall and Soskice, 2001)。自由市场经济有着市场导向型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激励型的激进式创新体系,但是它不能够生成像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那样的组织型的核心竞争力和协作渐进式的创新体系。相同的逻辑也适用于分析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

双重结构的中国经济有其重要的意义。双重结构意味着具有双重核心竞争力和双重创新体系,因而,同单一结构的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相比,双重结构的中国经济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凭借其双重核心竞争力和双重创新体系,中国经济便能够在更为广阔的工业部门和高科技领域里形成发展优势。

本书对双重结构中国经济模型的分析,突破了市场经济模式国际比

较研究领域中的制度体系内互动理论。该理论指明,在一般意义上,每一个经济体系只蕴含一种它所特有的经济模式,也即一种企业治理结构模式。由于该类型企业治理模式的运作机制覆盖了整个经济体系里的所有企业,它不能被分割或被限制在一部分经济领域里,这就使得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比如德国和日本)和自由市场经济(比如美国和英国),都只能够存在相应的一种企业治理模式。而本书发现,如果在某一个经济体系里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运作机制,它只覆盖一部分经济领域,那么就有可能在其他部分的经济领域里生成另外不同类型的运作机制。于是,这就可能使得两种根本不同的企业治理模式共同存在于同一个经济体系里。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特例。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国家在控股基础上发挥社会调和和组织协调功能,从而形成了协作导向型企业治理模式。这个模式的运作机制有着清晰的边界,因为国有控股的边界是清晰的,因而它能够被限制在国有经济部门里。而在国有经济部门边界之外,民营企业可以发展另一类完全不同的运作机制,即市场导向型企业治理模式。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同时存在两类不同的企业治理模式,而这并不违反制度体系内互动原则。作为特例,它支持并完善了该理论。

本书还认为,如果具备适当条件,较落后国家对较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economic convergence)是可能实现的。我们已经知道,在市场经济国际比较的研究领域里,其制度路径依赖和制度差异性理论并不支持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模式借鉴和经济赶超。但是正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本书发现,如果两个国家具有类似的经济模式,那么发达一方对落后一方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可能使得落后一方实现对发达一方的经济赶超。本书进一步分析表明,双重结构的中国经济分别与两类发达的市场经济在经济模式上相类似,这将支持中国经济双向赶超发达的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而来自这两类发达市场经济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直接驱动了中国经济的双向赶超。

本书还分析阐明了当今一些重要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中国市场经济的双重结构是否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唯一性,其他国家能否复制?中国模式的双重结构在高科技创新和全球经济竞争方面具有怎样的战略优势?同其他经济体系相比,在全球性的经济波动中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显示出较强的稳定性?双重结构的中国经济是否意味着中国转轨体制的结束?

在本项研究所属的国际学术领域里,本论著首次分析论证了中国双重结构的市场经济模式、其核心竞争力及其创新机制,也分析论证了中国经济是



如何双向赶超发达的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本书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经济在 1998—2008 年 10 年间的长期稳定增长正是建立在双重结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由双重核心竞争力、双重创新机制和双向赶超效应所驱动的。因此,本书将中国经济在这 10 年间的发展模式称为“经典模式”。这个“经典模式”在一方面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源,在另一方面,其双重结构市场经济的研究方法是对该国际学术领域的贡献。

### 0.3 简评《未来的中国市场经济》一书

《未来的中国市场经济》(*The Future of Chinese Capitalism*)一书由 Gorden Redding 和 Michael A. Witt 合著,并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 2008 年出版。该书也将中国经济同美国、德国和日本经济进行了比较。

该书作者分析了中国的制度环境及其对中国经济体系的影响。作者认为,中国的制度环境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这是形成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体制的深刻原因。作者也承认,在当今的中国,国家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而这对于中国的经济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使得国家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经济资源拥有所有权(p. 86)。

该书作者也对中国民营经济部门进行了描述,认为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以业主经营为主的商务体系(fragmented business system);作者也谈到了对于民营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融资模式、劳资关系和个人关系网等的一些认识。他们承认,市场机制是中国民营经济部门的主要运作机制。

但是该书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都没有触及中国经济的实质。

第一,该书的作者没有看到市场经济模式的多样性,即市场经济模式既包括建立在自由市场机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比如美英模式),也包括建立在社会调和和组织协调机制基础上的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模式(比如德日模式)(Hall and Soskice, 2001)。该书作者也没有看到中国国有经济部门和民营经济部门运行机制的不同,即前者类似于社会协作型市场经济而后者类似于自由市场经济。该书作者认为市场经济只有自由市场经济一种模式,他们笼统地将中国经济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进行对比。因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中国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处于无止境的转轨进程当中。

第二,该书作者没有看到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经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了公司化的改制。国